

棒杀与捧杀

——试析对柳永词的两种极端评价

曲向红

(山东财政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 柳永词因其对歌妓舞女的露骨甚至色情描写而在宋代被人以淫艳鄙俗之名棒杀,但在当代的批评中,其词却又被拔高到为妓女写心、代女性立言的高度。这两种评价都不免走入极端。诚然,柳永词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描写有局限性,但其花情柳思、俚俗之体对宋词的发展亦有深厚的涵养;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由男性掌握话语权,女性缺乏自己的声音,在男性意识的笼罩之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代女性立言写心的词作的。

关键词: 柳永; 词; 女性; 男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5-0101-05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5.016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柳永词作因其淫艳绮靡的女性描写而在宋代遭到棒杀,深为时人及后人诟病。但在当代的词学批评中,他的词却又被人以为妓女写心、代女性立言等评价高高捧起。本文拟从这两种走向极端的批评谈起,对柳词的评价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

一、棒杀与捧杀:两种极端评价

柳永长于纤艳之词,多冶游之作,其词充满青楼楚馆的香艳淫靡气息,弥漫着对歌妓舞女毫不掩饰的情欲,自其产生之日起,世人即对其发出不绝如缕的指责,如宋代吴曾说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1];王灼谓其“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喜道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2]。谩骂之中透露出极度痛恨之情。冯煦评价柳词“好为俳体,词多嫫黥,有不仅如提要所云,以俗为病者”^[3],批评之声更是强烈。近代吴梅言^[4]:“余谓柳词仅工铺叙而已,每首中事实必清,点景必工,而又有一二警策语,为全词生色,其工处在此也。……(《乐章集》)通本皆摹写艳情,追述别恨,见一斑而具全豹,正不必字字推敲也。惟北宋慢词,确创自耆卿,不得不推为大家耳。”认为柳词之工亦不过在其艺术手法,至于内容则不过“摹写艳情,追述别恨”而已,缺乏余味,只不过因为他创制了慢词,所以词学界才不得不推其为大家。这些词论家对柳词的淫艳鄙俗的内容都持批判态度,对其词的思想格调提出质疑,而且由其词格不高进而上升到人格,认为其“薄于操行”^[5],《宋史》亦不为其立传。即使有些论者对柳词加以部分肯定,也不过是肯定柳词的艺术技巧以及表现羁旅行役的所谓雅词,如赵令畴说^[6]:“东坡云:

收稿日期: 2008-12-18

作者简介: 曲向红(1979-),女,山东烟台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歌

世言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清代宋翔凤言柳词“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7]。柳永作的那些被认为不俗的词作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羁旅行役之情，而非对歌妓舞女的迷恋之情与香艳描写，所以得到了文人之流的肯定。

纵观上述对柳词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文人对柳词或是严厉指责棒杀，或是肯定其描写羁旅行役的雅词，大力批判其描绘男女艳情的俗词。不管哪种倾向，对其摹写男女艳情的词都是非常不满的。

进入当代的词学批评，大量论者对柳永均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肯定他“以俗为美”的词作“上承敦煌曲，下开金元曲子，在中间起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8]，“为宋代词苑带来了‘市民文学’的新气息和新作风，也为后来的金、元曲子开启了先声”^[9]。而且随着对人的价值的发现与肯定的呼声越来越高，论者对柳永代妓女立言的词作给予了极高评价，肯定了他“第一个把烟花女子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卑贱人物作为真正独立的人写进了词中，并全面系统地表现了她们的思想感情，使她们成为词中有血有肉的光辉女主人公”^[10]的创举，认为他是“以一种颇为平等的态度对待娼妓，以略带同情的笔触去写她们渴望自由、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愿望”^[11]。他“是把这些地位低下的女性当作了有同样智慧的人，而不是玩物”^[11]；他“不再把女性当成物化的审美个体和色情对象”^[12]，而是“真正了解歌伎，他笔下的歌伎才以自身的面目出现，柳永作为一个代言人，代她们抒发心中的感情”^[13]。因此柳永与其他玩弄女性的官僚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是完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下层女子，而没有丝毫轻视、玩弄、逢场作戏之意”^[10]。

二、极端评价之弊

为什么同样是描写男女艳情的词作却遭到了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上述两种评价到底哪一种更合理呢？对于柳词中那些情感描写过于直露的作品，我们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评价方式呢？

（一）棒杀：严苛而虚伪

表现男女香艳情感甚至带色情风味的词作，不仅仅是柳永一人在写，在当时以及后代的许多词人也都有创作，谁也不能免俗，如欧阳修“十五六，脱罗裳，长恁黛眉蹙。红玉暖，入人怀，春困熟。展香衾，帐前明画烛。眼波长，斜浸鬓云绿。看不足。苦残宵、更漏促”（《忆秦娥》），秦观“脸儿美，鞋儿窄。玉纤嫩，酥胸白”（《满江红》），比柳词风味如何？苏轼“笑倚人旁香喘喷”（《减字木兰花》）、“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满庭芳》）亦有柳词之鄙俗风味，而在宋代只是柳永对女性香艳的描写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并付出了落榜的代价，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

柳词天下传唱，即使是文人士大夫，对柳词亦充满难以遏制的兴趣，如《历代词话》卷五引《高斋词话》云^[14]：“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坡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观明明学了柳词，却不敢承认，这代表了当时及后代文人对柳词的态度：不敢公开表示喜爱柳词，但是在私下、在内心深处，他们都向柳词学习，受到柳词的沾溉。柳词传入禁中亦得仁宗之心，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引《后山诗话》云^[5]：“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骯骯从俗，天下咏

之，遂传入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可以说柳词作为一种娱乐消遣方式已得到世人的认同，尤其是正统文化之代表仁宗的默认。

然而，这种俗艳小词也给君臣带来道德上的恐惧。儒家诗教观对艺术的价值取向偏重社会功利的一面，此类小词不仅无补于世，且香艳绮靡，是儒家诗教极力抵制的，因此对于这种小词，君臣只能私下里喜爱，却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因此仁宗虽然颇好柳词，却又认为柳永不可令仕宦，对之打击冷落，这便可以做出一种对市井文化斥责的姿态，以掩饰其喜好俗词的真实心理，从而维护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之所以是柳永被推到风口浪尖，是因为“他词名广被，正是以浪荡游子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又以歌咏缠绵声色著名……在不自觉之间甚至成为宋代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有了相当的社会影响”^[15]。于是最终是他被定格为市井文化的代表，充当了倡导儒家诗教的正统文化与市井文化交锋的牺牲品，承担了正统文化对市井文化的鄙视与批评，备受时人及后人诟病。其他文人男性视角下对女性露骨色情的描写所应受到的抨击均为柳永一人承受。正统文化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宋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一方面声色犬马穷奢极侈，沉迷于俗艳之词的绮靡冶荡，一方面却又道貌岸然否定并排斥文艺给人的情感带来的宣泄与愉悦。

实际上，许多文人都受到柳永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秦观即是如此，就连明确以柳词为批判靶子的苏轼，也受到柳词的涵养。而且，柳词体现了一种市民意识市民情趣，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在花间词人手中日益雅化的词作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生机，对宋词发展功不可没，因而，对柳词极力棒杀是不公正的，也是虚伪的。

（二）捧杀：片面而拔高

作为一个长期浪迹青楼的词人，柳永与下层歌妓舞女有着长时间的接触交往和鱼水关系，应该说他更多的时候是以真心与她们平等相处，其词也赋予了她们较多的主体意识，但这是否就能像当代一些论者所说的他真正了解歌妓，对受压抑的妓女有真挚感情，他笔下的歌妓是以自身的面貌出现的呢？换句话说，柳永笔下的女性是真正具有主体自我意识，还是假象掩盖了栖息在男性目光中的真相？如果仍然是男性视角和话语体系中的女性，她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意识色彩，发出的就不可能是她们真实的心声。

如果对柳永的词进行全面而仔细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以下几点。

1. 男性视角始终窥视并捕捉着女性肉体

对女性肉体魅力的关注，柳词中随处可见。“身材儿、早是妖娆。算风措、实难描。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妍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自相逢，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合欢带》）“绛唇轻、笑歌尽雅，莲步稳、举措皆奇。出屏帷。倚风情态，约素腰肢。”（《玉蝴蝶》）这些从操纵者的男子视角看到的女性美，是离不开男子目光灼射的观赏品，具有十足的观赏性。读者虽然置身文本之外，但通过阅读的交流情境，通过柳永的男子视角所呈现出来的情景，自然便设身处地地站在男子的位置上感受女人的肉体魅力，从而进入欣赏的角色分享并领略到这美色带来的官能上的刺激与快感。

2. 将女性的价值归结在性功能上

柳永的目光定格在女人肉体魅力的渲染上，在他的描写中，女人是美丽的尤物，也是性的载体。闲情愁怨只因心上人远去独守空闺，孤宿鸳被，光阴虚度。而心上人归来她报复他的方法也是性上的惩治，“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锦堂春》）除此之外，她们几乎没有别的叫声与呼喊，她们唯一的声便是想男人。她们几乎被抽空了一切人格个性和社会生活的

角色责任,仅剩生物性因素。在她们身上只见“女”,不见“人”,女人作为性的存在被无限夸大,“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16]女人变成了性的象征物与载体,在文本中充当了满足男性情欲的对象。将女性的价值归结在性功能上,反映了柳永内心深处仍把女性当作从属于男性的玩物与性工具。

3. 漠视女性真实的心理感受

悲辛屈辱强颜欢笑的卖笑生涯,日夜用自己的色相供男人寻欢作乐。表面的轻歌曼舞纸醉金迷,难掩内心的寂寞与恐惧。年老色衰红颜老尽之后迎接她们的将是怎样的结局,相信她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她们的笑容应该有凄楚作底色,她们的欢乐应该有痛苦的影子。而柳永却很少关注到这一心理层面,在他笔下,她们就是舞台上妩媚性感的表演者,一颦一笑,都在迎合台下男性观众的审美口味,满足他们的心理期待;她们的喜怒歌哭都充当了男性品评的对象,她们的如花美貌狂歌醉舞,她们的欢喜愉悦一笑千金,她们的痛苦与忧伤,均给男人带来一种我见犹怜可资吟赏的美感。

沿着柳永词作显露出的男性视角,我们看到了他所关注的东西、想呈现的东西以及想给读者的“召唤视野”,也看到并把握住了他的真实态度与心理。而妓女对自己的情感表述完全不同,她们在词作中少有对自己肉体魅力的渲染,多的是对自己心灵苦痛的抒发,如一名唐代妓女的《望江南》:“莫攀我,攀我心太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寥寥几语即表达出了内心的悲凉与情感的苦痛;又如《抛球乐》:“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同样表现了抛洒真情后的余痛。再如南宋严蕊《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表现了沦落风尘的沉痛、屈辱以及对脱离妓籍的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可见柳永代女性立言、为妓女写心的词作,不过是“他”的话语而非“她”的话语,具有很大的虚假性,而且极具欺骗性,表面上是女性的心声,实际上仍然被深层的男性意识所笼罩,所以“不再把女性当成物化的审美个体和色情对象”而是“真正了解歌伎,他笔下的歌伎才以自身的面目出现”,这样的评论实在是脱离了柳永所处的社会而对其思想的片面拔高而已。

三、结 语

柳永在宋代被定格为俗艳文化流行的罪人,为虚伪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贬斥、黜落,其词作也被以淫艳鄙俗、不堪入目等语一棒打杀。作为理智的批评者,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其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描写有局限性,但其花情柳思、俚俗之体对宋词的发展亦有深厚的涵养,给宋词带来无限生机,比如其词对下层市民尤其是青楼女性生活与情感的关注,不仅增加了词的创作题材、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而且引入了生动、活泼的市民意识,对宋词平民化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社会由男性掌握话语权,女性缺乏自己的声音,在男性意识的笼罩之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代女性立言写心的词作的,只有当女性摆脱了男性意识的操纵,有了发言权,由她们之手才可能写出抒发女性真实体验的词作。

参考文献

- [1] 吴曾. 能改斋词话[C] // 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21-156.
- [2] 王灼. 碧鸡漫志[C] // 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67-118.
- [3] 冯煦. 蒿庵论词[C] // 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4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583-3599.
- [4] 吴梅. 词学通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70-71.
- [5] 胡仔. 茗溪渔隐词话[C] // 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1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59-183.
- [6] 赵令畴. 侯鯖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83.
- [7] 宋翔凤. 乐府余论[C] // 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3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493-2504.
- [8] 吴熊和. 唐宋词通论[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 200.
- [9] 杨海明. 唐宋词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252.
- [10] 苏者聪. 应当重新评价柳永的咏妓词[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3): 89-94.
- [11] 钱素芳. 谈柳永的叛逆思想[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3, (1): 34-36.
- [12] 白军芳. 系我一生心 负你千行泪: 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观[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1): 100-104.
- [13] 袁行霈. 试论柳词的俚俗[C] //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388-402.
- [14] 王奕清. 历代词话[C] // 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2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055-1323.
- [15] 过常宝. 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J]. 东方丛刊, 1998, (3): 210-220.
- [1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11.

Severely Criticized or Highly Praised

—— Analysis of the Two Extreme Comments on Liu Yong's Ci Poetry

QU Xianghong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China 250014)

Abstract: Liu Yong's ci poetries were severely criticized for the explicit pornography of images of prostitutes in the Song Dynasty. At that time, Liu Yong's ci poetries were considered as obscene and vulgar poems. But in contemporary comments, Liu Yong's ci poetries have gained positive image. His ci poetries have been regarded as a spokesman of prostitutes and females. All these two kinds of comments are inevitably fallen into two extremes. To be sure, Liu Yong's ci poetries, which were written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le, had its own limitations in the descriptions of females. On one hand, Liu Yong's ci poetries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Ci poet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and the vulgar style of writing.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atrilineal society, females could seldom hav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So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literati to write as a spokesman of female under the control of male ideology.

Key words: Liu Yong; Ci Poetry; Female; Male Ideology

(编辑: 饶道庆)